

黃稚荃著

杜鄰存稿



黄稚荃著

社
会
学
史
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何 华

杜邻存稿

黄稚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200千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013-3/I·124 印数：1—1,475

定价：3.95元



黄稚荃，四川江安县人，1908年生。早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后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曾任前国民政府国史馆纂修、立法委员、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等职。现任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四川诗书画院顾问、四川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成都市书法协会名誉主席等职。所作诗文书画，名重士林。

本书收录作者所撰古诗词研究论文、读书札记、题跋及回忆录等文章46篇。因其故居邻近成都杜甫草堂，名“杜邻”，故命书名为《杜邻存稿》。

前 言

予之生也，与疾病以俱来，儿时即多病；十余岁时，连年病疟；二十后，患脊骨结核；四十后，患阿迪森氏病，屡濒危殆，不能根治。近年，又加严重胆石病。幸在医药维持、生活安定、人事单纯之条件下，虽疾病困顿、竟得年逾八十。

予以常在病中，故性耽寂寞，饮食、服饰游乐，皆非所好。喜读书，尤喜诗与史。喜孔孟之书，而不喜宋儒性理之学。平居展卷，有疑义则探索之，有是非则明辨之，是以僻处易安，幽居靡闷。

有诗文稿及读书笔记多卷，“文化大革命”中，皆随诸书籍文物散佚。

四凶既除，举国安定，予欲藉今日之闲，弥昔日之阙，仍读书写作，忘其暮齿。四川人民出版社金汇海同志，念余衰病而旧稿散佚，劝余将能整理之稿尽量整理之；能记忆者，尽量回忆录出。不论长篇短幅，不限白话文言，但有仰于民族文化

者，出版社正须征集。予感于金君之言，遂整理残篇，补充近作，订成此册。

其中只三四篇为解放前之作，其余皆近十余年来所写也。

韩退之有言：“世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希，孰为使予歎歎而不可禁！”予于杜少陵、李义山、李易安实深有此感，故于三人之著作，除文字可查者之外，冥搜玄讨，于前人之论说，分辨当其否，真积力久，有与事实情理有全能印证者。至于生平师友渊源，骨肉休戚，亦记于此册中，征近人近事者亦或有可采之处。

此册之成，承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校阅订正，承林孔翼协助查证资料、张尚涛缮稿清稿，并此致谢。

黃稚荃

目 录

前言

- 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1)
杜诗札记 (13)
李清照著作十论 (49)
蜀中前代女诗人作品平议 (85)
刘禹锡《静安佳人怨思》及《玄都观》诗 (106)
黄山谷诗与杜诗无关涉 (108)
梅圣俞诗 (114)
林逋“山园小梅”诗 (116)
方回是发现宋广平《梅花赋》的功臣 (117)
与刘孟伉先生谈薛涛 (119)
答吴仲贤教授论七律 (122)

稚荃三十以前诗自序 (125)
《文选颜鲍谢诗评补》弁言 (128)

《空石居诗存》前言	(129)
《空石居诗存》后记	(132)
丁宁与《还轩词》	(135)
题冒鹤亭先生《水绘庵填词图》	(141)
记题曾彦《醉胡图》及寄外手札	(142)
贾使君碑跋	(144)
武则天书法	(145)
铭、颂、像赞、联语录存	(147)
眉楼联语	(150)
崇德老人	(150)
淮园	(152)
张简斋	(153)
梦雨	(155)
偶然巧合	(156)
前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及成立经过	(156)
张溥泉先生言行小记	(168)
忆黄晦闻师	(179)
朱山事迹	(192)
傅沅叔先生	(209)
悼赵香宋先生	(211)
向楚对辛亥革命及教育学术之贡献	(214)
我所知道的朱青长先生	
——答江安县志办公室同志	(227)

记长宁三前辈	(231)
刘豫波先生轶事	(235)
曹经沅小传	(238)
记曹纁蘅夫人	(240)
张默君	(242)
悼平江	(245)
悼大酉	(248)
新都遗稿	(251)
悼两妹	(253)
冷融和他遇害的前后	
——我所了解的事实片断	(257)
罔亟之恩	(278)

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元稹为杜甫作墓铭，对杜诗便作了评价，认为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也”。北宋孙仅也认为，杜甫是“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北宋秦观、李纲推杜诗为“集大成”。南宋朱熹、杨万里尊杜甫为“诗圣”。一千多年来，我国诗人咸奉之为诗宗。

杜诗之备受推崇，自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管窥所及，则以为自汉魏以来，诗人何啻千万，惟杜甫一人之诗，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在中国二千余年的诗史上，居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最关键的地位。他吸收了唐以前历代的优秀文学遗产，反映了由盛唐到中唐三四十年间的整个社会现实，树立了爱国诗、爱民诗的光辉典范，为后贤开辟了极正确极广阔的道路。

杜诗的优点，清人刘熙载概括得很好。他说：“杜诗的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惟其不借吐弃，故于吸收前人著作与乎斟酌自己的章句极为精严，绝不轻于取

拾。惟其广于涵茹，故“不薄今人爱古人”，于今古人著作，不轻加否定，转益多师，取精用宏。且眼前一切，皆纳之诗中，大而《北征》、《洗兵马》，小而《修水筒》、《树鸡栅》，内涵之广，千汇万状，森无涯涘。惟其工于曲折，故遇物能写难状之景，抒情能出不说之意，表达能力之强，使读其诗者，千载宛如目前，细大无不可观。

杜甫的思想和感情，亦可以高大深三字概之。杜甫以康济为心，契稷自许，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理想，具有“济时肯杀身”、“济时敢爱死”的精神，他最厌恶“各有稻粱谋”、“但自求其穴”的个人利己主义。此其高矣。当奉先探亲，“幼子饥已卒”时，他由自己的痛苦更推想到生活不如他的“平人”，乃至“失业徒”、“远戍卒”，使自己的忧愁亦更不能遏止。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室内漏雨时，他希望出现“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寒士”。他的《朱凤行》不啻为他自己写照。朱凤自己已很凄凉，“哀鸣侧顾”，但还“下悯百鸟在罗网”，“愿分竹实及蝼蚁”，此其大矣。杜甫“致君泽民”的思想始终如一，虽不在其位，造次颠沛，终无所易。《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已是绝笔，还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为国家祸乱未平，人民将继续受苦而担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种一往不返的忠爱之心，可谓深矣！

杜甫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资质既特异，又出生在“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便是初唐名诗人。杜甫早年就与高适、岑参、李白等为友，又处在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盛唐社会里。“读书破万卷”是很自然的事。“法自

儒家有，“心从弱岁疲”，说明家学渊源，少年时即很用功。杜诗三才万象，无不包罗，想其精研经史，旁及百家，唐以前所有之书，杜甫应无不遍读。

前代之书，对杜甫影响最深的，应以《诗》三百篇为第一。这部在汉代即尊之为经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时间是从西周到东周，地点几乎包括整个黄河流域，以及淮河江汉。作者有各阶级、各阶层的人。诗的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了当时的文治武功，兴衰治乱，不同阶级的生活状况、欢娱哀怨各种情感。语言生动优美，概括性极强。用西方文学术语称《诗经》为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是完全正确的。

《诗经》究竟是何人所收辑，何人所删定，大小序究竟是何人所作，至今尚有争论。但做这些工作的人，他们是认识到这些诗的珍贵价值，并珍视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治乱现实，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使诗这一文艺作品，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服务。

杜诗是三百篇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者。安史之乱发生，破坏了盛唐百余年来的安定局面和经济文化。杜甫由秦而蜀、而湘，流离转徙，忧时念乱，时政得失，贤贤嫉恶，一发之于诗，使天宝至大历三四十年间朝野面貌，皆从杜诗中反映出来。蔡梦弼说：“杜诗奋乎风雅不作之后，比兴发于真机，美刺该乎众体。”宋濂说：“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杜诗亦诚如此。杜甫凡所经之处，山川城廓、风土人情，皆历历见之诗中。读《佳人》诗，颇有《谷风》、《柏舟》之感。夔州之《负薪行》、《最能行》，写夔巫乡土之情，隐含诗人悱恻之意。《三吏》、《三别》、《哀王孙》、《哀江头》，

则变风变雅之音。《行次昭陵》、《收京》、《洗兵马》、《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雍容典丽，宏伟矞皇，《雅》、《颂》体也。

杜甫心迹，同乎屈原。屈原虽遭流放，而眷怀祖国，系心怀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不愿随波逐流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故司马迁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杜甫少年才气凌厉，对词赋之祖的屈原，似还未加重视，所以他早期的诗说：“气劖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中期历事既多，认识到屈原的伟大。他的诗说：“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透露出他对屈原的向往之情。后期出峡以后的诗说：“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到湖南后的诗说：“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杜甫经过十余年的艰难曲折，从他自己心灵的愿望和痛苦中，才对屈原有了深刻的了解，产生了凄凉留恋、深切的感情。杜甫窜迹夔巫，心念乱后民困，听到王缙在河南举办屯田，他便写诗赞赏：“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知道交广久未入贡，写出“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希望祖国极南极北的地方都有忠良以作守臣。《喜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诗云：“燕赵休矜出佳丽，宫帏不拟选才人”。眷怀故国，系心唐室，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的善良愿望和敦厚心情与屈原何异。杜甫集中的《同谷七歌》、《寄韩谏议》、《渼陂行》、《奉赠薛十二丈判官见寄》，超忽变幻，幽邈奇丽，虽非骚体，实类骚心。

杜甫早年山水诗学谢灵运，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渼陂西南台》，其章法句法，用玄理咏山水，全与大谢相同。自天宝乱后，寓秦州，作《秦州杂诗》、《同谷七歌》，及《发同谷县》，到《成都府》，沿途作诗，渐次摆脱大谢

寡白，纯用自己的语言写所经过山水的真实。杜甫《木皮岭》诗：“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看塞大明，俯入裂后坤”，这是杜甫对大自然的进一步的认识。他发觉五岳之外，也还有更高更大的山，不是前人所曾见到的。于是就所见到的山水，写自己的山水诗。后来瞿塘所作：“入天犹石色，穿地忽云根，”又“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纯用自心的感受，对大自然作真切描绘，使后人读之，仿佛身处巫峡重岩叠嶂之中，亲临洞庭浩瀚无垠之境，千古移情之作也。

杜甫于六朝人物中，最心折的是庾信。杜诗曾多次提到庾信，如“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第一首云：“羯胡事主真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梁亡，庾信身羁北周。他的《哀江南赋》、《枯树赋》、《拟咏怀》等都是自怨自艾的身世之感和对故国故乡的诚挚思念。故杜甫既怀庾信，亦借庾信以自况。次首，因庾信而及宋玉。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庾信八世祖滔，于晋元帝时由金陵迁江陵，得宋玉故宅以居，故次章即怀宋玉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连章诗，多前后脉络，精密相连。此云“亦吾师”，则前当已有师在，故知此“师”字上承庾信。

杜甫之于庾信，何以推崇至此？杨用修《丹铅总录》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子美称之为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

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

庾信《哀江南赋》是用极高的艺术手法反映侯景之乱、梁室崩溃的最全面最现实的文字，杜甫的《哀江头》、《哀王孙》等篇，其惊魂动魄，凄骨寒神，亦直追庾信。

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韵》为其病革最后之作。“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说自己携家避难，已到力不能支的时候。这诗起首四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用两联四句双起，用下句完成上句之意，乃庾信作诗之特有手法。此诗与庾信《拟咏怀》首四句“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句法完全相同，乃至“琴”、“心”二韵亦相同。这不是少陵有意摹仿，而是支离漂泊，身世相同，才力思想感情相近，造次属词，不觉其言之毕肖也。而此诗中复明点出“哀伤同庾信”，杜甫之于庾信，异代相知，师之友之，哀伤之情，深有同感，故临终之作，倦怀如是。

杜甫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绝不因袭摹仿，如蜂采花，酿而为蜜。将前人著作融为已有，结合当时的时代特色、社会情况，以及自己的遭遇和思想感情，然后超心炼冶，自铸伟辞，成为后代所尊敬的奉为诗宗的杜诗。

杜甫有绝不依傍他人的崇高的独立精神，有伟大的创造发展能力。人们说他的诗“与风雅相表里”，他自己也说“别裁伪体亲风雅”，但他没有写过一首摹仿《国风》、《小雅》的四言诗。他恨不见屈原，恨不见宋玉，但他没有一首摹仿《离骚》、《九辨》的骚体诗。他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却没有拟过苏

李的送别诗。他说“文章曹植波澜阔”，却没有一首拟陈思王的诗。他说“永怀江左逸”，却没有用过一首六朝乐府旧题。他的乐府诗，都是即事名篇，连乐府二字都不用，这种创作精神，是如何的独立特行，难能可贵！回头看看陆机、江淹等的拟古诗，拟古乐府，只觉内容重复，词句相同，优孟衣冠，令人生厌。萧子显《南齐书·文苑传》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杜诗之卓立千古，俯视百代，其新变多矣。

杜甫一生对时政得失，非常关心，不是徒托空言，不是以“致君尧舜”来夸大自己。杜甫不仅有政治见解，而且有政治主张，政治行动。如果遇合得时，他一定能有所作为，为国为民立下一番功业。杜甫早年与房琯、贾至、严武、高适等为友，他们是有共同政治主张的，房琯被谗罢相，他上书相救，祸几不测。《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杜甫并未认错，仍说房琯“晚为纯儒，有大臣体”。谢肃宗赦自己的死罪说：“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兹之意。”这样置一己之得失生死于度外，惟正义之所在，惟责任之所在，不惜冒白刃以赴，其风骨之峻，可为千古言官之楷模。

杜甫既贬华州司功后，《为华州王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建议诸将为犄角之进，对安庆绪打歼灭战。《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建议以亲王或重臣镇西川，以阆州、梓州为西川东鄙。与高适奏“请罢东川节度以益剑南”之主张，如出一辙。自房琯、严武、高适死后，杜甫便飘泊江湖，赍志以殁。虽心系长安，并不向长安有所干谒，其政治风度，可谓高矣！

杜诗本固枝茂，源深流长，对后世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历代诗人中，一人而已。

杜甫卒后不久，唐人对杜诗即有认识，韩愈推为“光焰万丈”。元稹对杜诗的认识更深，除《墓系铭》所作肯定之外，对杜甫的变革，是很有认识的。他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相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说杜甫用自己的思想，不依傍古人门户。元稹《乐府古题序》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说明元、白在不拟古这一点上，是深受杜甫启发的。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白二氏《长庆集》之通俗平易，当亦元白之“直道当时语”，是文艺创作上的一个进步，然而元、白还保留《乐府》之名，究竟不如杜甫。

孙仅谓杜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瞻博”，中晚唐服膺杜诗得其一体者大有人在。

晚唐学杜能工，当推李商隐。因牛李党争的牵累，他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他的《行次西郊百韵》是有意摹仿杜甫《北征》、《送千牛李将军赴阙五十韵》，“风调清深，属对律切”，殆越藩篱而进乎堂奥。《有感》、《重有感》三首，为甘露之祸而作。朱彝尊评此三诗，谓“用意精严，立论婉挚，少陵诗史，又何加焉。”李商隐《哭刘蕡》及《过崔充海宅》诗，立言用心，亦逼似杜甫。李商隐读书多，使事切，用心深细，其诗锤炼沉郁。王安石尤赏李商隐律诗，叹为“虽老杜无以过也。”宋初杨亿、刘筠的西昆体，专学李商隐，却大骂杜甫，可谓“数典而忘祖”。故《西昆酬唱集》只能掠得义山之浮艳而已。